

北京天主教南堂 在中西交流中的文化功能

余三樂*



北京天主教南堂（正面） 余三樂攝

當我們到歐洲旅遊時，到處都可以看到天主教堂：德國的科隆大教堂、意大利的米蘭多莫大教堂、佛洛倫薩的百花大教堂、威尼斯的聖馬可教堂，還有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都是金碧輝煌，美侖美奐，就連一個歐洲普通的無名小鎮的教堂，也堪稱一處藝術珍品。再看北京的南堂，儘管也有四百年歷史，但其規模其豪華程度都大為遜色。它作為北京主教座堂卻至今連一台管風琴都沒有，

* 余三樂，北京行政學院國際交流合作部副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利瑪竇分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著有《早期西方傳教士與北京》、《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另有譯著《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合作）。



位於南堂正南的沙勿略塑像 余三樂攝

相比之下，就像是豪門貴族面前的乞丐。就教堂而言吧，難道這還有甚麼可稱道的嗎？

其實不然，北京的天主教堂南堂，自1605年利瑪竇創建開始，就不僅僅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宗教場所，其如同在歐洲的任何一個城市中的教堂一樣，它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是在具有五千年歷史傳統的中華大地上、在幾千年以儒家學說為主導的封建王朝的都城裡的一棵天主教文明的種籽、西方文明的種籽，是遠在幾萬里之外的歐洲文化的一面鏡子。在最初祇有幾十間房屋的一方土地上的這一特殊建築，不僅承載着天主教這一外來的、與中國傳統宗教有着諸多不同特點甚至有着若干針鋒相對的矛盾的宗教，同時還像一顆閃爍着太陽七色光輝的小露珠一樣，體現了歐洲科學與藝術的方方面面：天文學、數學、力學、地理學和測繪地圖術、鐘錶術、水力學及水利機械、光學望遠鏡（及顯微鏡、眼鏡等）、印刷術等科學知識與生產工藝；音樂（包括樂器製造和樂理知

識）、美術（油畫和雕塑）、建築藝術、玻璃及琺瑯製品等藝術門類，以及西洋葡萄酒、西醫藥等等。換句話說，南堂不僅僅具備其宗教場所的功能，還具有展示西方科學、文化與藝術的博物館、演奏西洋音樂的音樂廳、進行科學實驗的實驗室、收藏圖書的圖書館、刻印出版圖書的印書局等多方面的綜合文化功能，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從利瑪竇定居北京開始，從皇帝、大臣到普通老百姓，無數家住北京或作客北京的中國人，甚至還有朝鮮人，正是從這座相對來說極為簡陋的天主教堂中，瞭解到世間還有另一種文明，一種與中華文明極為不同，但起碼可以與之並駕齊驅、在不少領域甚至處於領先地位的異質文明。以徐光啟為代表的晚明開明學者群體，因此而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驅。

進入清朝以後，情況有所變化，在順治、康熙兩代君主的推動下，西學進入宮廷，但也基本上被禁錮在宮廷之中。儘管如此，畢竟使不少明眼人如趙翼等，在參觀領略了南堂的異國風采之後認識到：“奇哉創物智，乃出自蠻貊。”“始知天地大，到處有開闢。人巧誠太紛，世眼休自窄。域中多壘拘，儒外有物格。”⁽¹⁾自順治、康熙皇帝開始，西方的天文學和觀天治曆之術、地理測繪之術以及數學、幾何學等學科就在中國學術界確立了不可動搖的主導地位，從湯若望開始，西方傳教士領導中國欽天監長達二百年之久。有人提及“利瑪竇等人把歐洲的天文、數學、地理等知識傳播到中國，給中華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²⁾的這一歷史過程，正是在北京（當然也包括其它地方的教堂）的天主教堂，特別是南堂最集中地體現出來。



今日位於南堂入口的利瑪竇像 余三樂攝

南堂的創建與歷次擴建之概況

一、1605 年利瑪竇創建南堂

1601 年 1 月 24 日，利瑪竇一行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再次進入北京。但是，利神父等人在最初的五年裡，都沒有找到合適的住所，一直租房居住。1605 年 8 月，利神父“聽說有一所房子出售，地點很合適，幾乎是在城區的中心（即宣武門內），面積很大，價錢合理。討價很低的原因是房子較老，而且據說裡面鬧鬼，用中國的法術都趕不走。幾個朋友被請來商量，其中包括徐保祿；他們不僅提出很好的建議，而且還湊足了進行這筆交易的錢。有了這樣的援助，三天之內就成交了。神父們於 8 月 27 日遷入他們的新居。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一間漂亮寬闊的禮拜堂，（……）後來又加蓋了三間房作為頂層，底層也增蓋了三間。”^{（3）}

他們這才有了一處令人滿意的久居之所。正如《利瑪竇中國割記》中所說的：“在這完成之後，北京的中心就永久地建立起來了，他們感到輕鬆多了。”^{（4）} 1608 年 8 月 22 日利瑪竇在給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還提到這處房子。他說：“我們新近購置這所宅院，靠近順承門（即宣武門），大小房間四十，十分寬敞，方便接見客人。”^{（5）}

二、1610 年南堂第一次擴建（同年 5 月 11 日利瑪竇於南堂逝世）

1610 年，神父們感到原來的教堂已不夠用了，打算加以擴大。李之藻等人出資促成了這件事。熊三拔神父曾在後來的一封信中回憶道：“李氏（即李之藻）曾立有遺囑，給利氏捐白銀四十兩，以作建築北京聖堂之用，不久前還捐獻過十兩。（……）這的確給利氏幫了大忙。他為教友們立了好榜樣，聖堂得以興建，原來的太小，是坐落在房舍之中。利神父委託我負責建築工程，托天主之福，用了二十天工夫，把主要的部分建妥，相當美觀，中國人無不感到驚奇。”^{（6）}

1987 年澳門《文化雜誌》刊載了一篇題為〈17 世紀葡國為建造北京兩座最早的耶穌會教堂所作的貢獻〉的文章，引述了前人著作中有關南堂這次擴建的寶貴史料：

教堂的面積為 8 x 16 米（在圖紙上呈兩個正方形），擁有一個典雅的正面，可能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側堂頂部為連環拱廊和飛簷相結合，祭臺比通道的地面高出三個臺階。

可能由於這座教堂建築規模很小，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來證實教堂的建造是否得到當時皇帝和朝廷的支持和參與，也沒有留下有關建築要求及其規格的資料。祇知道教堂於 1610 年春季開工，到了 5 月 14 日工程已經提前進入了最後階段，並於利瑪竇死後整整一年之際（1611 年 5 月 3 日）正式啟用，開始宗教祭禮活動。^{（7）}

裴化行根據國外史料對南堂的擴建作了如下的描寫：“把兩幢三開間的房屋改為兩層樓”，

“還鑿了一口可供食用的水井”，利神父“長久苦於小堂狹小，教徒祇好不顧嚴寒酷暑在院子裡做禮拜，於是下決心建造一間寬敞的大廳”，教堂採用歐洲樣式，“使我們的教堂不像和尚廟”。由於地皮有限，經費也不充裕，規模仍然不大。“大廳長 70 尺（羅馬尺，合 0.24 米），寬 35 尺，門楣、拱頂、花簷、柱頂盤悉按歐式；唱詩班席昇上三級臺階。”⁽⁸⁾

中國文人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對當時的南堂有如是之記載：“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狹長，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詭異，其國藻也。”⁽⁹⁾

從上述史料記載我們得知，新的教堂是一座歐式建築，兩層樓高，形狀狹長，長是寬的兩倍。堂內祭壇分左右兩部分，左供耶穌，右供聖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耶穌“左手把渾天圖”——將神學與科學結合了起來，這正反映了利瑪竇的科學傳教策略。

三、1650 年湯若望主持南堂的重建

據《正教奉褒》載，1650 年，“上賜湯若望宣武門內天主堂側隙地一方，以資重建聖堂。孝莊文皇太后頒賜銀兩。親王官紳等亦相率捐助。若望遂鳩工興建。”⁽¹⁰⁾湯若望承蒙皇上賞賜，得到原利瑪竇所建教堂旁邊的一塊土地，同時得到皇太后和達官貴人的捐資，因此得以興建新的天主堂。

在這之前，“教會內教民祈禱都是在一座外面瞧不出來任何特徵的聖堂內舉行，這在當時中國全國都是一樣的情形”。⁽¹¹⁾這是由於當年利瑪竇為了不使天主教過份張揚，而採取的“韜晦之策”。湯若望這時則依仗自己在大清王朝中的威望，而要“建一座真正的、如同歐洲教堂一般的教堂了。”“這個教堂的建築圖樣，當然是他自己之所繪畫。並且監工的工頭也是他自己充當的。”⁽¹²⁾

這是一座典型的巴羅克式的建築，從平面看是一個十字架形。長 80 尺，寬 45 尺。魏特的《湯若望



今日南堂內景 余三樂攝

傳》根據湯若望的回憶和書信資料，對當時新建的教堂作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細的描述。兩年之後，新建教堂主體完工，在隨後的幾年裡，湯若望又主持建築了一些附屬設施。

順治皇帝為南堂的竣工親筆題寫“欽崇天道”四個大字的匾額，“命禮部尚書與孔子六十六代孫衍聖公，行大禮，齋送到天主堂內，敬謹懸掛”⁽¹³⁾。次年順治帝再書“通玄佳境”的匾額，贈予天主堂。不久，於1653年（順治十年）又撰寫了洋洋一千多字的《天主堂碑記》。現在，這一石碑在經歷了近三百五十年的風風雨雨後仍保存在南堂院中。

當時的弘文院學士劉肇國專門撰寫了一篇〈贈天主新堂記〉，記述了他所見到的教堂擴建時的施工情況，以及他在教堂中與湯若望交談，瞭解湯氏建堂初衷等。文中說道，順治七年（1650）“孟秋之望，肇國過從泰西湯先生所，聞匠石聲。叩之，云：稍新堂構，以事天主也。”劉肇國對此很感興趣，“請得而瞻仰焉”，他看到教堂的設計中規中矩，工程質量堅好，一個十字架位於十分突顯的位置。房檐下有兩通石碑，一通撰寫的是有關天主教教理的文字，一通“以叙建堂之緣起也”。劉肇國對湯若望說：“治曆者先生久留之故，傳教者先生遠來之故也。”⁽¹⁴⁾一語點破了南堂曆

法和傳播福音之間的關係，即湯若望迢迢幾萬里來華，原本是為了傳教；但中國朝廷准其留居京師，主要是讓他治理曆法；而他致力於給朝廷修曆，最終則是為了傳教。

四、從1679年始徐日昇建造南堂的鐘樓、安裝管風琴，並擴建南堂建築

從1679年開始，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徐日昇為南堂建造了鐘樓，安裝大型管風琴，繼而主持了對南堂



照片為改建與擴建工程所會檔案館藏。在北堂建設的同時，康熙皇帝“以宣武門內天主堂規模狹隘，另給銀一萬兩，飭令重修”。這次對南堂的重修由徐日昇主持。

關於徐日昇主持的南堂改建工程，劉松齡記曰：“至是日昇更建新堂九所，將舊堂廣而大之，俾成歐式。除主壇外，別建小壇三，各有壇場。”⁽¹⁵⁾但是他沒有註明此次改建與擴建的起始和竣工時間。《中國近代建築總覽》一書指出：“南堂在1703-1712年間重



湯若望像

來自高智瑜、林華、余三樂編《歷史遺痕》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建，‘徐日昇與閔明我予以改造，成為歐式。’”(16)

重修工程完畢後，康熙將贈與北堂的“萬有真元”和“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的對聯又題寫一份，此外“又作律詩一首，一併送至堂中”。(17)

御題律詩云：

森森萬象眼輪
中，須識由來是化
工。

體一何終而何
始，位三非寂亦非
空。

地堂久為初人
開，天路新憑聖子
通。

除卻異端無忌
憚，真儒佞個不欽
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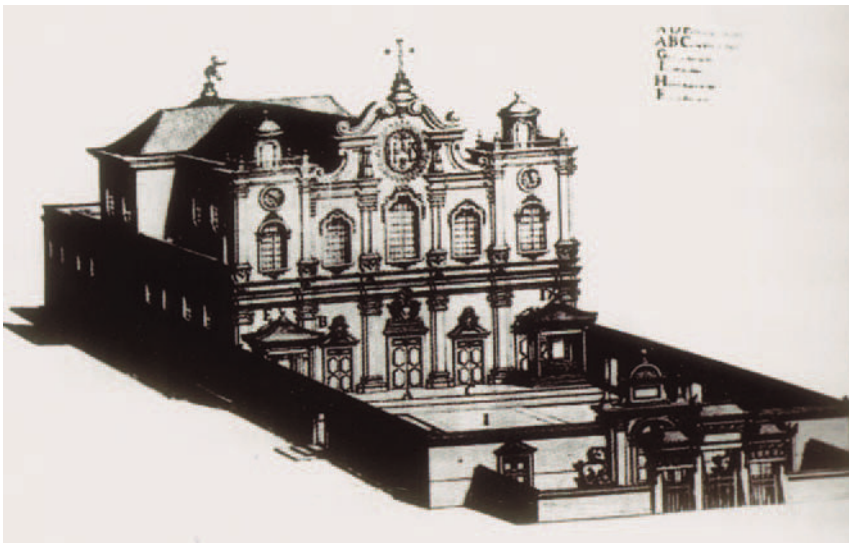
從徐日昇為南堂修建鐘樓起，至南堂的擴建完成，總共花費了三十二年時間。

五、1775年南堂遭遇重大火災，乾隆皇帝賜銀重建

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十四日，宣武門天主堂起火。關於這場火災(1775年陽曆2月13日)，樊國梁有如下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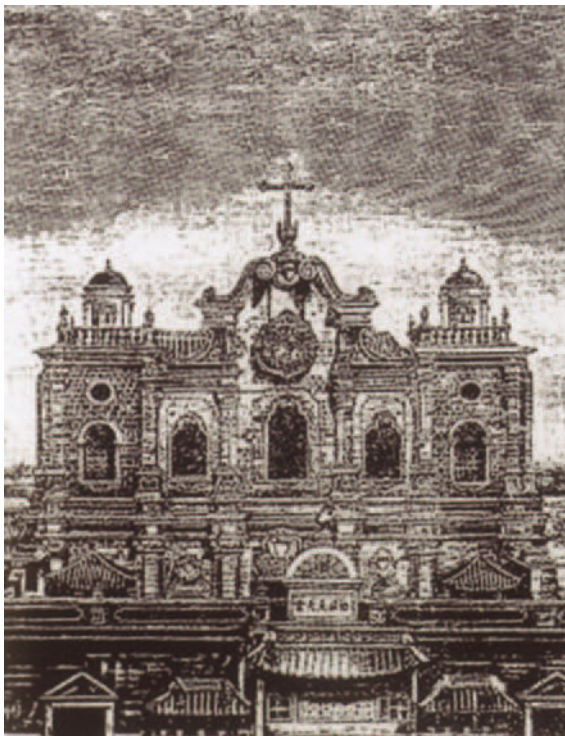
眾修士齊集南堂，慶賀本會總統之姑祖母、聖女加大利納利克西之瞻禮。正在舉行大祭之時，忽有煙火之氣由臺下而出，撲鼻難忍，主祭者幾不能畢禮。細加查驗，亦杳無所見。迨修士信友出堂後，始知堂內火發。各牖烈焰飄飛，迅於電掣，畫棟雕樑，霎時俱成灰燼。(18)

由於康熙皇帝的御書匾額對聯在火災中亦被焚燬，高慎思、安國寧等引咎奏請議處。但是乾隆皇帝對傳教士們寬大為懷，不僅沒有怪罪他們，反而“賜銀一萬兩，着於原址建復。上又親書匾額對聯，賜懸堂中，以復舊觀”。(19)乾隆此舉顯然與其大力禁教的政策有所不同：



經湯若望改建後的早期南堂外貌圖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藏



湯若望改建的南堂正面外貌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藏

凡此表彰聖教，寵眷西士之盛舉，在聖教因厄時，差足與禁教之文誥相抵，使京畿一帶，無甚大風波。即去京較遠省份，悉聽風聲，亦有所忌憚，不敢肆意仇教。(20)

樊國梁對此亦有記載：

次日皇上遣官弔問，照康熙皇上助建此堂之例，特賜帑銀一萬兩，以資重修。又御筆親書匾額、對聯，令懸掛堂中，以復其舊。朝員聞此異典，皆來額賀。修士等催工督匠，不日修工告竣。然已囊空資竭，錙銖無存矣。(21)

可見儘管皇帝賜銀重建了南堂，但這場火災造成的重大損失，特別是在圖書、儀器、禮器、壁畫直至管風琴等方面的損失，已無可彌補了。

明末清初的北京南堂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顯示的多種文化功能

一、展示西方藝術（繪畫及雕塑）的博物館

相對於其它方面來說，西方美術（包括雕塑與繪畫）對中國人的影響最為形象和直觀，因此眾多參觀過南堂的中國人都論及他們在這方面所得到的感受和震撼。

早在明朝末年刻印的《帝京景物略》就對當時南堂的雕塑與繪畫作了如是記載：

供耶穌像其上，畫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把渾天圖，右叉指若方論說次，指所說者。鬚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隆其准，目容有矚，口容有聲，中國畫繪事所不及。(22)

談遷也在其筆記中談到西洋繪畫的魅力：

其畫以胡桃油漬絹抹藍，或綠或黑，後加彩焉。不用白地，其色易隱也。所畫天主像，用粗



經湯若望改建的早期南堂內圖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藏

布，遠睇之，目光如注。(23)

乾隆年間的文人姚元之曾對南堂的由著名畫師郎世寧繪製的壁畫作了最為詳細的記述——

南堂內有郎世寧線法畫二張，張於廳事東、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立西壁下，閉一眼以觀東壁，則曲房洞敞，珠簾盡卷。南窗半啟，日光在地，牙籤玉軸，森然滿架。有多寶閣焉，古玩紛陳，陸離高下。北偏設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羽於中，燦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髮。壁上所張字幅篆聯，一一陳列。穿房而東，有大院落。北首長廊聯屬，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潤。又東則隱然有屋焉，屏門猶未啟也。低首視曲房外，二犬戲於地矣。再立東壁下，以觀西壁，又見外堂三間。堂之南窗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密立。堂柱上懸大鏡三。其堂北牆樹以隔扇，東西兩案，案鋪紅錦，一置自鳴鐘，一置儀器。案之間設兩椅。柱上有燈盤，四銀柱矗其上。仰視承塵，雕木作花，中凸如蓋，下垂若倒置狀。俯視其地，光明如鏡，方磚一一可數。磚之中路，白色一條，則甃以白石者。由堂而內寢室，兩重門戶，簾櫳窅然深靜。室內几案遙而望之飭如也，可以入矣，即之，則猶然壁也。線法古無之，而其精乃如此，惜古人未之見也。特記之。(24)

姚元之仔細描寫了郎世寧繪於南堂東、西牆壁上的兩幅壁畫。他先是立西牆下而看東牆，然後又立東牆下看西牆。壁畫內種種陳設，林林總總，栩栩如真。特別是由日光照射所形成的“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髮”，給人一種“似可以入”的錯覺，然而當他真的走到跟前，“則猶然壁也”。他歎息西洋畫法的精妙，甚至為無緣一見此畫的古人而惋惜。

差不多是同時代人的張景運，也對南堂的壁畫作了長篇惟妙惟肖的描寫，他站在畫前“凝眸片晌，竟欲走而入也，及至其下捫之，則塊然堵牆而已。殆如神州瑤島可望不可即，令人悵惘久之。”(25)

另一文人蔣士銓寫了題為“泰西畫”的長詩，更是生動地反映了中國文人對西洋畫法的贊賞：

(……………)

鉤簾貼地風不興，隔窗喚人人不應。
有階雁齒我欲登，蹋壁一笑看文綾。
乃知泰西畫法粗能精，量以鈿尺累黍爭。
紛紅駭綠意匠能，以筆着紙紙不平。
日影過處微陰生，遠窗近幔交縱橫。
紅葉欲香樹有聲，小李將軍莫與衡。
若對明鏡看飛甍，一望淺深分暗明，
就中掩映皆天成(……………)(26)

詩中對西洋畫法的明暗處理和立體逼真感都作了形象生動的描繪。

清代常有朝鮮使團來北京，很多使臣都曾到南堂參觀並在他們的筆記、文集作了記錄。其中一名叫樸趾源的曾對南堂的壁畫作了生動詳細的描述：

今天主堂中，牆壁藻井之間，所畫雲氣人物，有非心智思慮所可測度，亦非言語文字所可形容。吾目將視之，而有赫赫如電，先奪吾目者。吾惡其將洞吾之胸臆也！吾耳將聽之，而有俯仰轉眄，先屬吾耳者。吾慚其將貫吾之隱蔽也！吾口將言之，則彼亦將淵默而雷聲。(27)

以如此之文字描寫出西洋壁畫對他產生的強烈震撼力。這是指遠看，再說近看，不禁令他對西洋畫的明暗處理、細節逼真的技法歎為觀止。

逼而視之，筆墨粗疏，但其耳目口鼻之際，毛髮腠理之間，暈而界之，較其毫分，有若呼吸轉動，蓋陰陽向背而自生顯晦耳。(28)

接着樸趾源列舉了壁畫上所見的婦人(即聖母)、孺子(即聖子)，還有令東方人瞠目結舌的西方神話故事——

鬼車鳥翅如蝙蝠，墜地宛轉。有一神將，腳踏鳥腹，手舉鐵杵，撞鳥首者。有人手人身而鳥翼飛者，百種怪奇，不可方物。左右壁上，雲氣堆積，如盛夏午天，如海上新霽，如洞壑將曙，蓬瀛勃鬱，千葩萬朵，映日勝暈。遠而望之，則綿邈深邃，杳無窮際，而群神出沒，百鬼呈露，披襟拂袂，挨肩迭跡，而忽令近者遠而淺者深，隱者顯而蔽者露，各各離立，皆有憑空御風之勢，蓋雲氣相隔而使之也。（29）

再看藻井，即頂部的壁畫：

仰視藻井，則無數嬰兒跳蕩彩雲間，累累懸空而下，肌膚溫然，手腕脰節肥若緣紋，驟令觀者莫不驚號錯愕，仰首張手以承其墜落也。（30）

西洋美術作品對東方人如此強烈的震撼力來自於其獨特的明暗處理和“透視法”。利瑪竇曾對中國人說明油畫的明暗處理法：

中國祇能畫陽面，故無凹凸。吾國畫兼畫陰陽，故四面皆圓滿也。凡人正面則明，而側面處即暗；染其暗處稍黑，斯正面明者顯而達矣。（31）

南懷仁在《歐洲天文學》中專列一章論“透視畫法”。他說：“透視法以她明亮的眼睛，是第一個抓住皇帝眼睛的藝術形式。的確，在我們的天文學剛剛得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年的年初，透視畫法就緊接着自由地進入宮廷。”他滿懷自豪之情向他的歐洲同胞描述道：

你恐怕難以相信，這一藝術是如何地吸引着每個人的注意力。不僅僅是北京的居民，而且包括從其它省份到北京來的人。他們看到後，就禁不住地贊口不絕，說這路徑、回廊和庭院是如此的深邃，這圓柱和其它所有的東西在絕對平面的畫布上魔術般地立體化了，這圖畫是如此地接近真實！這些從未見過甚至從未聽說過這樣高超藝術的觀看者們，



利瑪竇送給萬曆皇帝的聖母油畫像就是本圖之摹品
取自意大利《“利瑪竇與中國”展覽》一書



取自意大利《“利瑪竇與中國”展覽》一書

當他們突然站在這些畫有房子和花園的圖畫前面的時候，就完全被征服了，被迷惑了，而以為他們看到的是真實的房子和花園！（32）

南懷仁在《歐洲天文學》中還記述了一種奇妙的壁畫。他說：

我們在北京的居住地的花園四周都有圍牆，閔明我神父根據光學的法則，在每一面牆上都畫了一幅與牆的長度相符的差不多五十英尺長的壁畫。當人們站在壁畫正面觀看的時候，僅僅可以看到山巒、樹木和獵場的圖景等等，但是當人們從一個特殊的角度來觀看時，這幅畫裡就奇迹般地真真切切地出現一個人或者至少是另外一種動

（本版兩幀〈利瑪竇像〉摘自英特網）

物。有一天皇帝來參觀我們的居住地，他一幅接一幅地欣賞這些壁畫，看得很慢很仔細。到了最近這些日子，每天都有那些高官們陸陸續續地頻繁造訪我們的駐地。他們也是來欣賞這些壁畫和其它類似藝術作品的。他們無不衷心贊美這一藝術，儘管因為圍牆的表面延伸得如此遠且十分不規則，儘管因為牆上開的門和窗戶相當程度地損害了壁畫的完整性。甚至有的人僅僅就是站在正面觀看，就已經是贊不絕口了。（33）

以上這些生動形象的描寫，使我們可以聯想到歐洲教堂的那些美輪美奐的藝術傑作，也可以想見這些歐洲藝術對中國人及其他東方人的巨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那個時代的南堂的確不愧為展示西方美術的博物館。

二、展示西方樂器和演奏西方樂曲的音樂廳、“歌劇院”



P. MATEO RICCI ITALIANO, DE LA COMPAÑIA DE JESUS
INSIGNE MATEMÁTICO Y PRIMERO QUE EVANGELIZO
EN PEKIN. HIZOLE EL EMPERADOR MANDARIN Y RE



利瑪竇進京時就攜帶一架西式鐵琴。明人馮時可《蓬窗續錄》云：

余至京，有外國道人利瑪竇。(……)道人又出番琴，其製異於中國，用銅鐵絲為弦；不用指彈，祇以小板案，其聲更清越。(34)

據此可以認為這就是中國的第一架古老的鋼琴。清初，談遷在南堂中看到了這架琴，稱這種西洋樂器為“天琴”：

琴以鐵絲。琴匣縱五尺，衡一尺，高九寸，中板隔之；上列鐵絲四十五，斜繫於左右柱，又斜梁；梁下隱水籌，數如弦；綴板之下，底列雁柱四十五，手按之，音節如譜。(35)

尤侗以此琴入詩：“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

(本版兩幀〈徐光啟像〉由余三樂提供)

響自高低；阜城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並自註曰：“天主堂有自鳴鐘、鐵琴。”(36)

經湯若望改擴建後的南堂設置了高大的鐘樓，後經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的改建，鐘樓裡的大鐘能定時奏出洪亮悠揚的樂曲，令北京的市民驚歎不已。南懷仁在描述北京市民如何熱衷於教堂鐘樓奏出的美妙音樂時，曾把南堂稱作“歌劇院”。他滿懷驕傲地寫道：

因為鐘聲傳揚得遙遠和廣闊，使得我們的教堂也在帝國都城裡名聲遠播。爭相前來目睹的百姓擠得水泄不通。無論如何，最令他們驚奇的是每到一個整點前鐘樓所奏出的序曲音樂。的確，因為徐日昇神父特別精通音樂，他設計了很多能奏出和諧音樂的鐘鈴，用車床精密地製造出來，然後懸掛在鐘樓正面最高的塔樓上，塔樓是敞開的。在每一個鐘鈴裡，他按



照歐洲方式〔中譯者註：中國式的銅鐘都是從外面敲擊發聲的〕用鐵絲繫上一個精心設計的鐘錘，使它們能奏出美妙和諧的音樂。在鐘樓的空隙間，他放置了一面圓柱形的鼓輪。在這鼓輪上，他用插上一些表示音階的、相互之間的間隔成比例的小釘的方法，預置了中國音樂的聲調。當時間快到了該敲大鐘的時候，這鼓

輪就自動地起動，借助它的重力旋轉起來。鼓輪上的那些小釘把繫鐘錘的鐵絲帶動起來，敲擊演奏出完美的中國音調。這前奏樂一結束，那大鐘就立即以深沉厚重的音響敲起來。

我實在無法用言詞來形容這一新奇精巧的設計是如何使前來觀看的人們感到狂喜的。甚至在我們教堂前廣場之外的廣大街區裡，都不能阻止這擁擠、失序的人潮，更不要說我們的教堂和教堂前的廣場了。特別是在固定的公共節日裡，每個小時都有不同的觀光者潮水般地、絡繹不絕地前來觀看。雖然其中絕大部分人是異教徒，但他們還是以曲膝下跪、反複叩頭在地的方式向救世主的塑像表示他們的敬意。我期盼着，感謝徐日昇神父此刻正在建造的而即將提早完工的管風琴，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樣，那時將會有更多的人們聚集到這個新建的“歌劇院”前，進而通過這種方法，使每一個靈魂在管風琴和其它樂器的奏鳴聲中贊美我們的天主！（37）

南懷仁這裡提到的由徐日昇安裝的管風琴更是令中國人感興趣和大開眼界。乾隆年間，曾以撰寫《二十二史劄記》而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趙翼曾參觀了南堂，撰寫了題為“西洋千里鏡及樂器”的短文，其中就以大版篇幅描繪了教堂裡的管風琴，並且還吟誦了一首題為“同北墅、漱田觀西洋樂器”的長詩。趙翼在短文裡這樣描繪管風琴的：

有樓為作樂之所。一虬者坐而鼓琴，則笙、簫、盤、笛、鐘、鼓、鐃、鐃之聲，無一不備。其法設木架於樓，架之上懸鉛管數十，下垂不及樓板寸許；樓板兩層，板有縫與各管孔相對，一人在東南隅鼓鞀以作氣，氣在夾板中盡趨於鉛管下之縫，有縫直達於管；管各有一銅絲繫於琴弦；虬鬚者撥弦則各絲自抽頓，其管中之關振而發響矣。鉛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竅竅，以像諸樂之聲。故一人鼓琴而眾管齊鳴，百樂無不備，真奇巧也。又有樂鐘，並不煩人挑撥，而按時自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中的楊廷筠像

鳴，亦備諸樂之聲，尤為巧絕。(38)

他在長詩中吟道：

(……………)

斯須請奏樂，虛室靜生白。

初從樓下聽，繁聲出空隙。

噌吰無射鐘，嘹亮蕤賓鐵。

淵淵鼓悲壯，坎坎岳清澈。

鐸于（古代的一種銅製樂器）丁
且寧，磬折拊復擊。

瑟稀有餘鏗，琴淡忽作霹。

紫玉鳳喚簫，煙竹龍吟笛。

連桐柅揭底，頻櫟鉏鋸脊。

鞀（撥浪鼓）耳柄獨搖，笙舌炭
先炙。

吸噓竽調簧，節簇筳赴拍。

簫疑老嫗吹，筑豈漸離（高漸
離，古代擊筑樂師）擲。

琵琶鐵彈撥，箏瑟銀甲劃。

寒泉澀箏篴，薄雪飛筆篴（古代
一種竹製樂器）。

孤倡輒群和，將喧轉消寂。

萬籟繁會中，縷縷仍貫脈。

方疑宮懸備，定有樂工百。

豈知登樓觀，一老坐搗擘。

一音一鉛管，藏機振關膈。

一管一銅絲，引線通骨骼。

其下轉風囊，呼吸類潮汐。

絲從囊罅綰，風向管孔迫。

眾竅乃發聲，力透腠理晷。

清濁列若眉，大小鳴以臆。

韻乃判宮商，器弗假瓠革。

雖難繼詔護，亦頗諧繳繹。

白翎調漫雄，朱鷺曲未敵（白翎、朱鷺二古
曲名）。

奇哉創物智，乃出自蠻貊。



Noel Golvers 著 *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 J. (Dillingen, 1687) 一書的插圖〈耶穌會士在欽天監〉

緬惟華夏初，神聖幾更易。

鷺鷥（鳳凰的一種）肇律呂，秬黍（秦人以
此規定長度單位）度寸尺。

嶧谷（昆侖山的山谷）截綠筠，泗濱采浮石。

元聲始審定，萬古仰創獲。

迢迢裨海外，何由來取則？

伶倫與後夔（伶倫：黃帝時的樂官；後夔：
堯時主管音樂、舞蹈的大臣），姓名且未識。

音豈師曠傳？譜非制氏得（師曠：古代著名
樂師；制氏，漢代的樂官）。

始知天地大，到處有開闢。

人巧誠太紛，世眼休自窄。



南懷仁像

域中多壚拘，儒外有物格。
流連日將暮，蓮漏報酉刻。
歸將寫其聲，畫肚記枕席。(39)

這首長詩有很多生癖古字，讀起來詰屈聱牙，典故頗多，理解起來十分困難，卻是難得的對當時南堂管風琴最為生動詳細的描寫。唐代詩人白居易曾寫了千古名篇〈琵琶行〉，這首長詩應該是清代的〈管風琴行〉。

詩的開頭，先寫了作者在聆聽管風琴演奏時的感受，他用琴、瑟、簫、笛、鞀、笙、竽、箏、篪、筑、琵琶、箜篌、箏篴等眾多中國樂器的發聲效果來比附和描繪這一西方樂器演奏的音樂的豐富表現力和感染力。作者起初以為，一定是有上百名樂工共同演奏，“豈知登樓觀，一老坐搗擊”，僅一個人彈琴就產生一個樂隊的效果。作者然後對管風琴的構造及其發音原理作了

描述，並驚歎道：“奇哉創物智，乃出自蠻貊。”這麼奇妙的樂器，竟然出自中國以外的地方！而且也不是中國樂師“師曠”所傳，樂譜也不是古人沿襲下來的。作者終於領會到：“始知天地大，到處有開闢。人巧誠太紛，世眼休自窄。”就是說，這時我才知道天地是如此之大，到處都有新的發明創造；靈巧智慧的人實在是非常多的，不要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得過於狹窄。但是“域中多壚拘，儒外有物格”，中原士人的眼界總是很拘謹，要知道除了儒學之外還有很多其它學問啊！最後作者寫道，我流連忘返，不覺天色已暮，自鳴鐘告訴我時間已至酉刻（即晚九、十點鐘）。回家後我還是非常興奮，無法入睡，於是就將今天的所見所聞寫下來，記錄在枕席之上。

這一文一詩是反映國人對管風琴認識的極有價值的史料。雖然趙翼此詩此文作於1759年，大約是徐日昇安裝管風琴五十年以後的事情了，但這管風琴無疑還是當年徐公所為，因為來華傳教士中，在



南懷仁著《歐洲天文學》拉丁文原書之書名頁

製造安裝管風琴方面無人能出其右。

後來訪京的朝鮮人也對南堂中的管風琴做過一些描述。

三、展示西方科學儀器的展覽館和進行科學實驗的實驗室

秉承利瑪竇科學傳教的遺風，南堂的歷代主持者都十分重視科學。南堂中設有自己的小型觀象臺，陳列了不少有關天文、地理甚至有關水利方面的儀器，使前往參觀的中國人大開眼界。

晚明文人劉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就將位於宣武門內的天主堂描寫成展示西洋奇器的博物館：

其國俗工奇器，若簡平儀。儀有天盤，有地盤，有極線，有赤道線，有黃道圈。本名範天圖，為測驗根本。龍尾車，下水可用以上，取義龍尾，像水之尾尾上昇也。其物有六：曰軸、曰牆、曰圍、曰樞、曰輪、曰架。潦以出水，旱以入，力資風水，功與人牛等。沙漏，鵝卵狀，實沙其中，顛倒漏之，沙盡則時盡，沙之錄兩準於時也，以候時。遠鏡，狀如尺許竹筍，抽而出，出五尺許，節節玻璃，眼光過此，則視小大、視遠近。候鐘，應時自擊有節。⁽⁴⁰⁾

國人一般對特殊的天文儀器可能茫然無所知，但對望遠鏡的功能則比較容易認識，因此對望遠鏡的記述也比較多。

前面談及的趙翼除了特別關注管風琴之外，對望遠鏡也很感興趣。他在〈西洋千里鏡及樂器〉一文中對望遠鏡作了比較詳細的描述：

堂（指南堂）之旁有觀星臺，列架以儲千里鏡。鏡以木為筒，長七、八尺；中空之而嵌以玻璃，有一層者、兩層者、三層者。余嘗登其臺以鏡視天，赤日中亦見星斗。視城外則玉泉山寶塔近在咫尺間，磚縫亦歷歷可數。而玻璃之單層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兩層者悉倒，三層者則又正矣。⁽⁴¹⁾



郎世寧自畫像

來自顧衛民著《基督宗教藝術在華發展史》
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2003 年出版

詩人趙懷曾撰寫了題為“遊天主堂紀事”的長詩，詩中寫到了南堂裡的觀象臺：“又築觀象臺，儀器匠心造。橫鏡曰千里，使人齊七曜。乃於窺天微，兼得縮地妙。所惜昧禕祥，但解推蝕眇。”最後，他也承認中國學者在科學方面的不足：“吾儒通三才，本異索隱誚。因疏專門業，致被遐方笑。”⁽⁴²⁾

朝鮮人洪大容參觀南堂時也看到了望遠鏡。他在《湛然燕記》中寫道：

鏡制，青銅為筒，大如鳥銃之筒，長不過三



順治皇帝像

周尺許，兩端各施玻璃。下為單柱三足，上有機為象，限一直角之制，架以鏡筒，其柱之承機為二活樞，所以柱常定立，而機之低昂迴旋，惟人所使也。柱頭墜線，所以定地平也。（……）持以窺天，暗淡如夜色。以施於鏡筒，坐凳上遊移低仰以向日，眇一目而窺之，日光團團，恰滿鏡筒，如在淡雲中，正視而目不瞬，苟有物，毫釐可察。蓋異器也。（43）

此外，南堂也有展示歐洲地理科學的世界地圖。朝鮮人洪大容記述道，在南堂客廳的牆壁上，“東壁畫蓋天星象，西畫天下輿地”（44）。這種繪有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圖無疑也會給前往參觀的中國人和朝鮮人以極大的震撼。

南堂又是進行多種科學實驗的實驗室。

明末傳教士熊三拔曾與徐光啟合作著有《泰西水法》一書。當時他在南堂內製作了若干水利儀器，國人爭相一睹為快。曾為《泰西水法》撰序的鄭以偉稱，1612年他造訪熊三拔的住所，“見其家，削者、槩者、絢者，皆治水器也”（45）。這些新



南堂會議廳門上懸掛順治皇帝所題“通玄佳境”匾額

奇的水利工具吸引京城的官員學者紛紛來到北京會院。有記載曰“都下諸公聞而亟賞之”，不少人還“募巧工從受其法，器成即又人人亟賞之。”⁽⁴⁶⁾在一段時間裡，南堂既是熊三拔試製水利工具的實驗室，又是展示這些水利工具的展覽館。

發生在1668年年底的三次對日影長度的測定，是對歐洲天文學、乃至於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命運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南懷仁準確的預測直接導致了康熙朝歐洲天文學的回歸和天主教的復興。然而他的這一成就與他在南堂曾經進行過的多次試測、特別是多次失敗是分不開的。他曾回憶道：

我經常在我們住所的院子裡研究日影問題，



現存南堂的順治皇帝題碑

余三樂攝

尤其是幾個不同長度的標杆的影長。我常常會觀察到我所計算的結果與實際日影發生誤差，有時是算少了，有時則是算多了。我推測這些誤差是由於我的設備的不精確而造成的。⁽⁴⁷⁾

正是他不斷地從失敗中學習，堅持不懈地試驗，才得以逐漸提高預測的精度，最終在關鍵時刻取得令人贊歎的成就。

閔明我神父運用水力學的原理，製造了一座以源源不斷的水流來驅動的時鐘，“在這部機器的頂部站立着一隻精緻的木製小鳥。這隻小鳥能逼真地模倣大自然中的鳥鳴。在清晨，它能報告應該起床的時間，它在那一時刻開始唱一支歌，其聲響足以將熟睡的人喚醒。”閔明我準備將此作為貢品進獻給皇帝，“以至名聲大振，召引大批高官顯貴來到我們的住所，在它還未進獻給皇帝之前，就得到了如潮的贊美”。當康熙皇帝得到這一西洋奇器時，便禁不住“龍顏大悅”。⁽⁴⁸⁾閔明我進一步試製了一幢用水銀驅動的時鐘，“他的這一嘗試簡直可以稱作是全新的發明。通過八個月的試驗，這種計時器被證明在準確性和可靠性上遠遠超過了以往的儀器”。在南懷仁寫下這段話的1680年前後，“儀器已經做好了，祇是還沒有將它進獻給皇帝。”⁽⁴⁹⁾

更值得一提的是南懷仁在南堂試製的用蒸汽發動的模型車。他寫道，大約在1676-1677年間，“我用輕質木材製造了一架兩英尺長的小四輪車。在車的中間安裝了一個小容器，裡面填滿了燒紅的煤塊，以此做成一個蒸汽發動機。憑藉這個機器，我很容易地就驅動了這架四輪小車。”不僅如此，他還製造了用蒸汽驅動的小船模型。“我可以將這架蒸汽動力機所體現出來的力學原理，很容易地用來為其它任何一種機器提供動力。舉例說，我製作了帶有像是鼓足了風帆似的一艘紙船，並且讓它持續地沿着一個圓週航行”⁽⁵⁰⁾這一發明要比公認的蒸汽機發明人鄧尼斯·帕平（Denis Papin）的設計最少提早了十年。

由此看來，北京的天主教南堂作為科學實驗的

實驗室，在有些方面甚至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展示西方科學與造紙、印刷術的圖書館和出版新書的印書局

書籍是知識的載體，從利瑪竇開始，所有的來華傳教士都非常重視書籍的作用。利瑪竇在寄往歐洲的書信中多次提出要求，希望能得到有關天文學、數學等學科最新成就的書籍。鄧玉函在即將踏上中國土地時，曾向他的舊時同僚伽利略討要科學新著。當金尼閣、衛匡國從中國返回歐洲招募年輕傳教士來華時，募集圖書也是其重要任務之一。1614年金尼閣返回歐洲晉謁教皇保祿五世，獲得大量贈書，在周遊歐洲各國時，又得各國王室捐贈，1618年攜七千冊書東來，一時間傳為盛事。被稱為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楊庭筠極為興奮，面對汗牛充棟的西方書籍，他曾立下宏願：西洋書籍“所稱六科經籍，約略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且在可譯”；“假我十年，集同志數十手，眾共成之”；“人壽苦短，何哉？吾終不謂如許奇秘，浮九萬里溟渤而來，而無百靈為之呵護，使終湮滅。”⁽⁵¹⁾ 這批書籍很大一部分輾轉抵京，藏於南堂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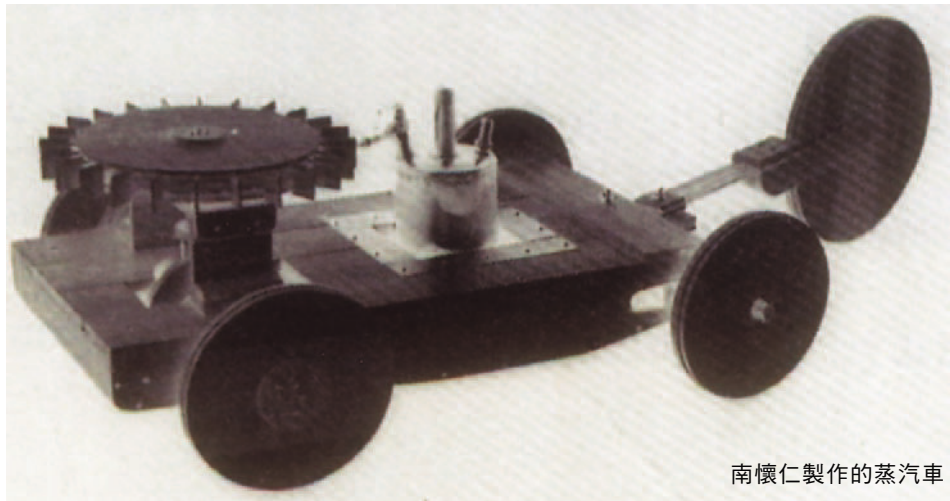
1613年，在南京太僕寺少卿任上的李之藻上〈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李之藻在陳述了翻譯西洋天文書籍以改進中國曆法的必要性之餘，還進一步說，除了天文曆誌書籍之外，西學還有“水法之書”、“演

算法之書”、“測望之書”、“儀象之書”、“日軌之書”、“萬國圖誌之書”、“醫理之書”、“樂器之書”、“格物窮理之書”等等，“以上諸書，多非吾中國書傳所有”，“皆有資實學，有裨世用”。⁽⁵²⁾

1626年（天啟六年）王徵入京為官，專門拜訪鄧玉函、湯若望等傳教士，請教西洋奇器。鄧玉函等笑着拿出有關這方面的西洋書籍說：“專屬奇器之圖之說者，不下千百餘種。”王徵看到“諸奇妙器無不備具”，“種種妙用，令人心花開爽”⁽⁵³⁾，便迫切地提出願與他們合作將書譯成中文。這就導致了王徵與鄧玉函合作翻譯《遠西奇器圖說》一書。

畢拱辰是另一名從南堂的藏書中獲得靈感的中国文人。1634年，他在京師與湯若望相識，一日，畢氏談及“貴邦人士範圍兩儀天下之能事畢矣，獨人身一事尚未睹其論著，不無缺望焉？”湯若望拿出一幅〈西洋人身圖〉給畢拱辰看，並說：“西庠留意此道，論述最夥，但振筆日譯教中諸書，弗遑及此，請以異日。”畢拱辰細觀此圖，“其形模精詳，剖剗工絕，實中土得未曾有”。過了幾天，畢拱辰又造訪南堂湯若望，湯公將已亡之鄧玉函早在杭州李之藻家避難時與一不知名的中國文人合作翻譯的《人身說》二卷相示。畢拱辰讀後，極為折服，稱該書“縷析條分，無微不徹。其間如皮膚、骨節諸類，昭然人目者，已堪解頤”，“使千年雲霧頓爾披豁”。他驚歎道：“余幸獲茲編，無異赤手貧兒，驀

入寶山，乍睹零璣碎璧，以不勝目眩心悸，骨騰肉飛，遑待連城鼉采，照乘夜光哉！”⁽⁵⁴⁾ 畢拱辰因此發奮，將舊譯本重新潤色修飾，與《人身圖說》合裝為二卷刻印，乃我國第一部介紹西方生理學及解剖學著



南懷仁製作的蒸汽車



王徵與鄧玉函神父合譯《奇器圖說》



王徵像

作。此類事例不勝枚舉。

書籍同時又是造紙、印刷技術的體現。儘管西方的造紙和印刷術最早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但是到了16-17世紀之後，西方的造紙術和印刷術都已經相當發達，而且與中國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西洋紙張的質地比中國紙張厚實、耐用，可以雙面印字而不至於滲透到背面。因此，當中國人在南堂看到印刷精美的西洋書籍的時候，無不感到驚訝新奇。

利瑪竇在世時，費奇觀來京時曾攜帶了一部精美、豪華的八卷集多種語言對照的《聖經》。這是紅衣主教塞維里尼（Cardinal Severini）送給中國傳教團的禮物。在聖母昇天節，利神父在自己的居所展示了這部《聖經》。他描寫道：“很多人到教堂來參觀這些書籍，對印刷和裝訂大感驚異，他們會說：‘毫無疑問，人們用這樣的工藝如此精緻地刊印這些書，其中所包含的教義一定是很了不起的。’”⁽⁵⁵⁾

清初訪問過南堂的談遷，對西方紙張做了如下的記述：“其書疊架，蠶紙精瑩。劈鵝翎注墨橫書，自左向右，漢人不能辨。”“製蠶紙潔白，表裡夾刷。”⁽⁵⁶⁾清代的皇帝也十分喜愛這種西洋紙，有時候傳教士們就以這種特別的紙張作為貢物晉獻給皇帝。

有記載說，湯若望時南堂已建有一座“頗具規模、收集了大量宗教書籍、圖畫和包括了數學、天文學的多卷本叢書的圖書館”⁽⁵⁷⁾，藏書約三千多冊。⁽⁵⁸⁾不幸的是1775年的一場大火，使南堂的圖書館遭受了毀滅性的損失。在這以後北堂圖書館成為收藏西方書籍最豐富的圖書館。據統計，1860年南堂圖書館藏書為五千四百冊。⁽⁵⁹⁾

南堂不僅是收藏西方書籍的圖書館，也是出版介紹西方科學、文化與宗教等中文書籍的印書局。利瑪竇定居北京南堂之後，將以往出版過的幾部中文著述《天主實義》、《交友論》等再版，又出版了

新作《二十五言》、《幾何原本》、《畸人十篇》、《同文算指》、《圓容較義》、《渾蓋通憲圖說》、《乾坤體義》等等，幾乎他的所有中文著作都是在北京的南堂刻印出版的。不僅如此，就連明王朝下令編纂的卷帙浩繁的《崇禎曆書》也是在南堂刻板的。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攻入北京，不久又倉皇撤離，縱火焚燬皇宮和民房，火勢也殃及處於宣武門附近的南堂。當時在南堂留守的湯若望率領前來避難的教徒，奮力保護教堂，才使存有《崇禎曆書》大量木版的兩間房子免遭毀滅，以致在清軍進入北京之後，得以將新法曆書獻給朝廷，繼而頒行天下。

其他傳教士的很多著作也是由南堂刻印出版的，祇是當時並沒有打出自己的招牌。後來的北堂（西什庫教堂）就在自己刻印出版的書籍中印上了特別的標誌：北京西什庫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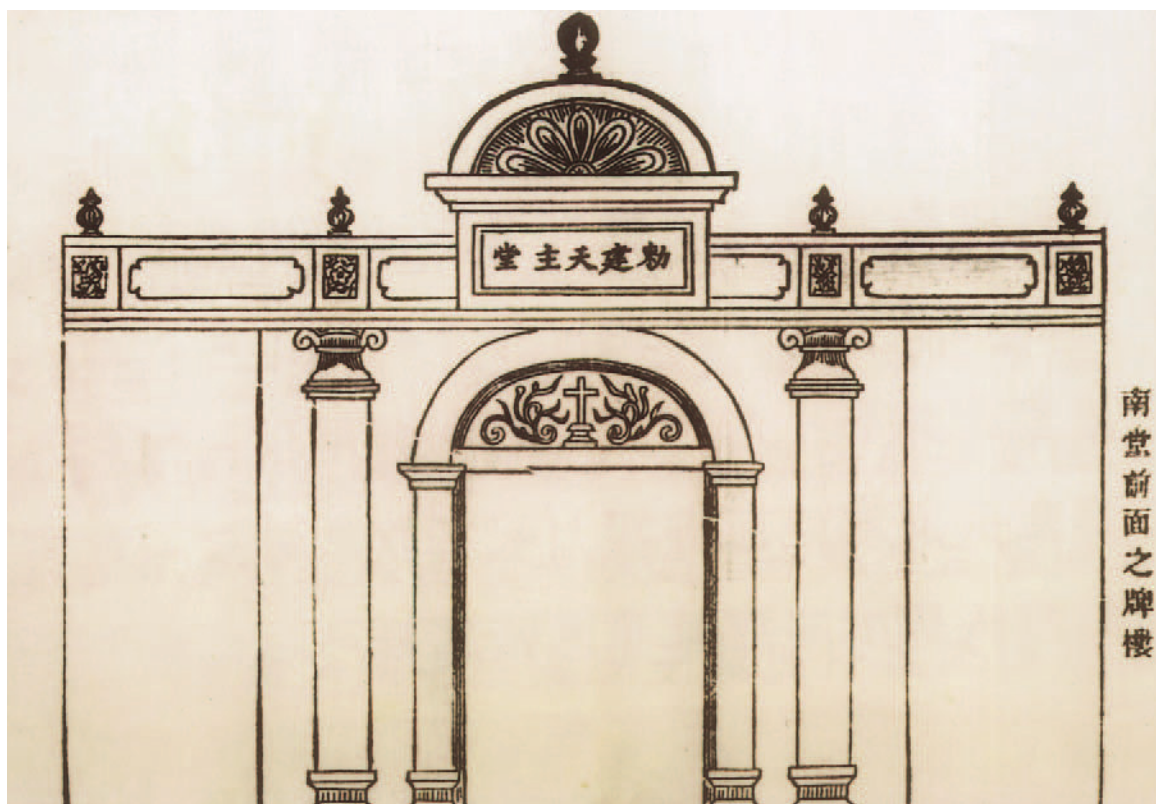
五、歐洲巴羅克式的建築及園林樣式

經湯若望主持擴建和改建的南堂，是一座典型

的巴羅克式建築，從平面看是一個十字架形。魏特的《湯若望傳》根據湯若望的回憶和書信資料，對當時新建的教堂作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細的描述：

教堂內部藉立柱之行列把教堂之頂格闢為三部。各部皆發圓，作窟窿形，有若三隻下覆之船身。其中間頂格之末端作圓閣狀，高出全部教堂，圓閣上更繪種種聖像。中部頂格兩邊之頂格為一塊一塊方板所張蓋。教堂正面門額上，用拉丁文大字母簡書救世主名字 IHS 字⁽⁶⁰⁾，四周更以神光彩飾。教堂高出毗連房屋之上三十餘埃勒（歐洲的一種長度單位），很遠處即能望見。

教堂內築祭壇五座。正中大祭壇上供奉救世主大聖像，周圍為天使與曲膝跪地上之宗徒所圍繞。救世主一手托地球，一手伸出作降福狀。正壇左面即光榮的方面，設聖母瑪利亞祭壇。壇上供羅馬聖母瑪利亞大教堂內所供奉施乃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所載南堂牌樓圖

(Schnee) 所製聖母慈悲大聖像之複本。右面祭壇上供奉聖彌協爾大天使和其他天使。立柱之間設伊納爵和方濟各·沙勿略祭壇。各祭壇前方皆以欄杆圍繞。教堂內部之地上，密以精細四方石塊鋪墊成各種花樣，其上更鋪設地毯。⁽⁶¹⁾

教堂院內的花園也以歐式建造，康熙年間有中國學者描寫如下：

“玩瀾亭”，兩旁有小池。左池水上高三四尺；右池水四道，上噴高四五尺。左右另築小方窖，設機竅，用水四散噴注，以溉竹木。⁽⁶²⁾

這應該是中國土地上最早的噴水和噴灌設施。後來乾隆皇帝命傳教士在圓明園修“大水法”，說不定也是從南堂的花園中受到了啟發。

凡有機會參觀南堂的中國學者、官員，對其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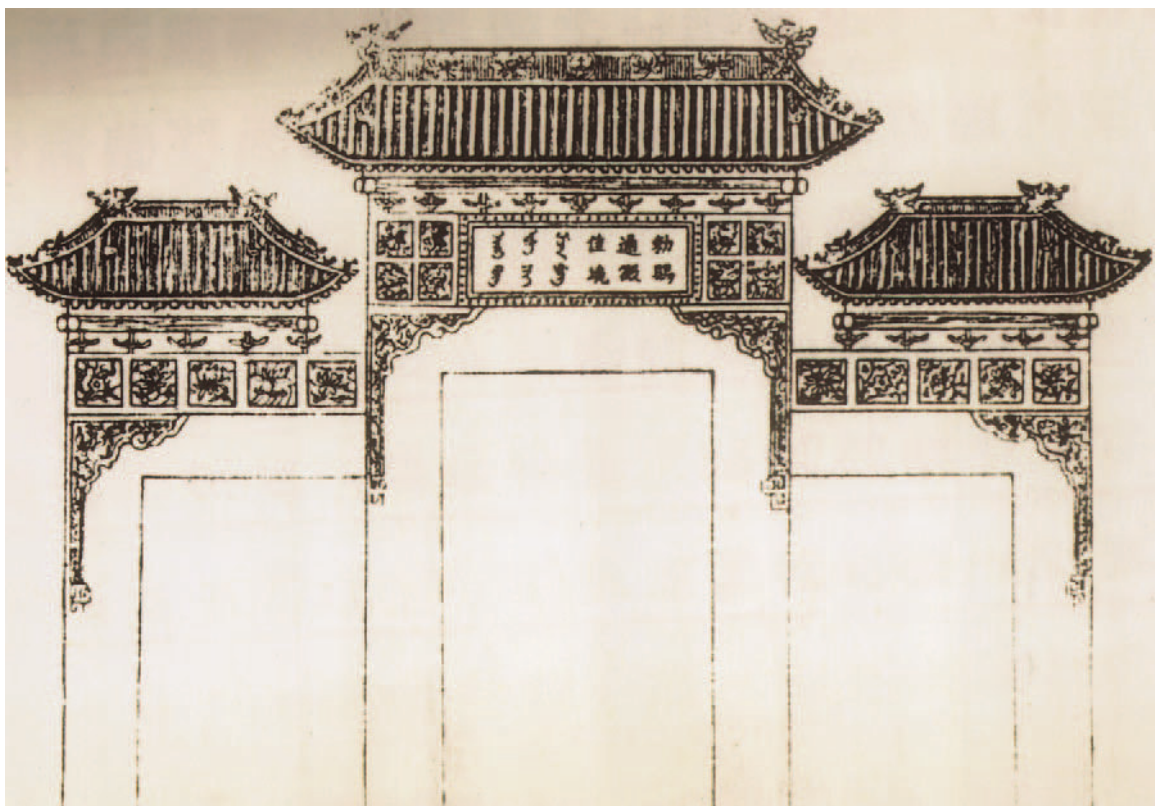
築、園林無不交口稱贊，如曰“明爽異常”，“極其工巧”，“足稱奇觀”云云。⁽⁶³⁾

六、其它方面（葡萄酒和酒器、西醫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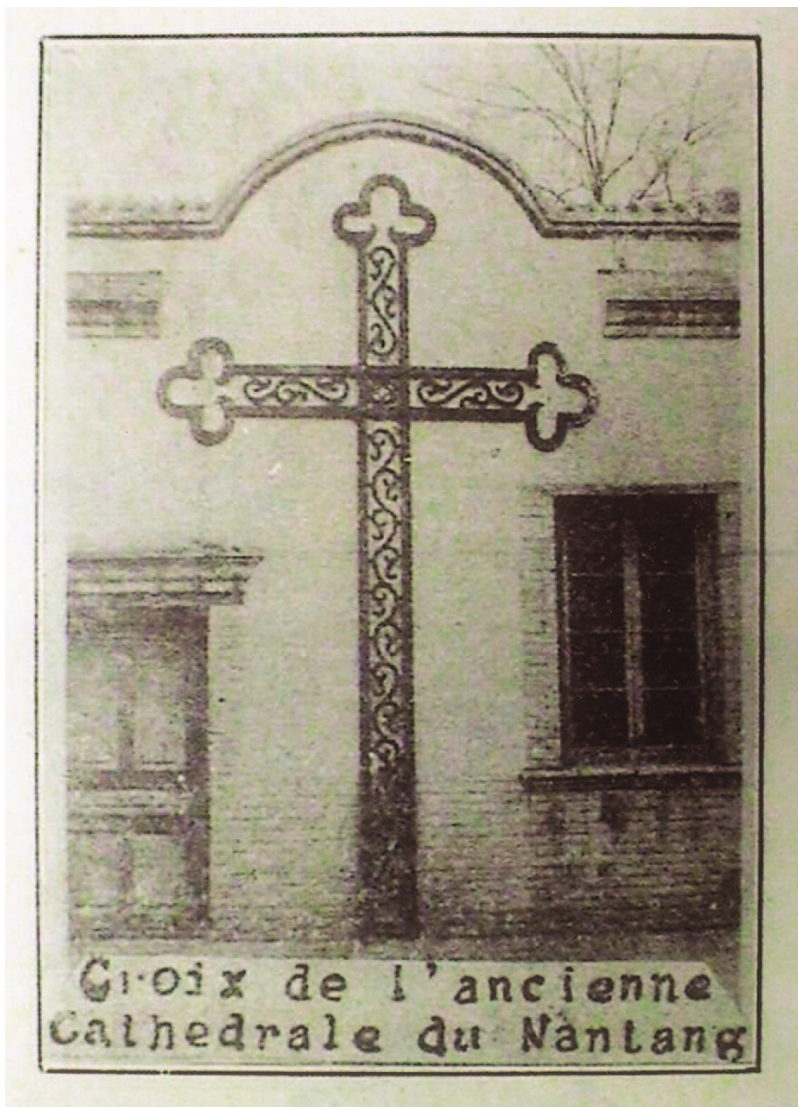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也有關於葡萄酒的記載，“葡萄美酒夜光杯”即是唐詩中的名句。但那時飲用葡萄酒的多是西北少數民族，中原的漢人不知道如何釀造葡萄酒，也難得有機會品嚐到這種酒。當利瑪竇進入北京後，葡萄酒就被帶到了北京城，因為做彌撒必須要飲這種象徵着耶穌的血的葡萄酒。

湯若望主持南堂時，曾邀請幾位中國的文人朋友到南堂一起品酒。他們不僅對甘露瓊漿般的洋酒大加贊賞，而且對西洋的酒器和飲酒的禮節推崇備至，紛紛寫下了熱情洋溢的詩篇。《贈言合刻》一書中就收錄了幾首這樣的詩歌。

其一是禮部尚書胡世安題〈道末先生邀同行屋貳公飲和（荷）蘭貢酒〉：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所載南堂入口圖



北堂“西什庫”印局標誌

遐陬扇皇風，一十有三載。古昔不庭區，梯航來每每。和（荷）蘭輕重洋，修貢自西海。異物匪朝珍，傾葵應有宰。奇釀羅諸邦，瓶貯色爭璀。丹震凜禹箴，惡旨寓下逮。頒予通微師，故國味斯在。秋色老梧桐，幽軒殊芳靄。招飲共獻酬，甘洌資澆磊。手捧玻璃杯，心惟酒語諧。沉湎絕九重，衍宴及臣寮。先生廣此意，觴政贈一解。（64）

置。盈盈異香浮，霍爾消積滯。平生耽麴蘖，市沽甘酣寐。豈知天壤寬，海外有此異。譙樓笳聲急，嚴城將欲閉。醺然促歸輿，歎息文德備。（65）

詩的大意是，中華的聲教影響到極遠的地方，荷蘭國人遠渡重洋來進貢，貢獻了很多珍奇物品，特別是清冽的洋酒。洋人飲酒有洋人的規矩，一種酒要用三個器皿來盛，四種酒就要十二個器皿。玻璃酒杯製作精巧，與酒瓶交相輝映。這種酒來自天邊，

其意為：順治皇帝登基已有十三年，古時從未進貢過的國家，現在經常來訪。善於航海的荷蘭國前來進貢，貢品中的洋酒色澤璀璨。皇上將其賞給了通微教師，使他嚐到了家鄉的味道。在秋天的老梧桐樹下，湯先生請我們來他的住所品嚐此甘冽的洋酒。我手捧着玻璃酒杯，沉醉在來自遙遠地方的佳釀之中。

其二是國子監祭酒薛所蘊題〈湯先生招飲上賜和（荷）蘭貢酒〉：

聲教被遐荒，和蘭重譯至。方物多珍奇，不貴越裳雉。維酒清且烈，各國釀有制。一種三器盛，四種十二器。玻璃製精巧，燦爛文理其。罍實色互映，表裡如一致。舟航天際來，蛟龍應所嗜。扁鑰固重篋，二年得供御。異人湯先生，上前全拜賜。持歸通微堂，馨聞莊遠暨。叩友二三人，相延就客次。啟罍歡命酌，開樽心已醉。珀光與珊瑚，精彩難逼視。甘露和瓊液，不知何位

蛟龍也喜歡喝。酒瓶裝在好幾重的匣子裡，還用鎖鎖牢。兩年才進貢一次，皇帝全都賞給了湯先生。湯先生把酒拿回住所通微堂，酒的馨香就帶進來了。湯先生邀請二三朋友來做客，高興地打開酒瓶，酒香就已經令人心醉了。酒的顏色有如琥珀和珊瑚，酒液如甘露和瓊漿。我平生好飲酒，常到市上沽酒，回家一醉方休。哪裡知道世間之大，海外還有此等奇異的酒。城頭上預示要關閉城門的梆聲已經敲響，趕緊醉醺醺地登車出城回家，仰歎湯先生的文章和道德。

這兩首詩形象地寫出了湯若望和中國官員文人在南堂一起品嚐洋酒的情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方大千世界給中國人的影響。與西洋紙一樣，這種於健康頗為有益的西洋酒也得到皇帝的垂青。康熙皇帝專門給海關官員下令，如有西洋酒進關，須用蠟封好，直接送入宮廷。

關於西醫藥學，前面提到的劉侗、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一書，也記述了鄧玉函精通西醫的故事。鄧玉函稱：“其國劑草木，不以質咀，而蒸取其露，所論治及人體精微。每嗜中國草根，測知葉形花色，莖實味香，將遍嘗而露取之。”⁽⁶⁶⁾這就

是今人所說的“中藥西製”。他打算將這些知識撰寫成書，然而卻未竟而卒。

羅啟明常常為缺醫少藥的貧困百姓實施外科手術，“世人獲治者為數甚眾”⁽⁶⁷⁾。羅懷中早年即從名師研習藥理及外科手術，來華後為教內外人士醫病歷三十年。“地方人士暨大小官員”凡經救治者，“均仰其高藝，深表敬重”。他還在教堂創立“診所一處，義務醫療”，雖然也“不時奉詔入宮，但尤樂與貧者親。病者或艱於行，則躬往顧之”。⁽⁶⁸⁾在禁教時期，很多中國教友，就是以求醫為藉口進入教堂的。

南堂在北京幾座天主教堂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於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天主教耶穌會士的存在，由於明清的皇室和朝廷對部分歐洲科學文化的需求，也由於北京作為中華帝國首都的獨特的城市功能，北京在 17-18 世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北京的四所居住着傳教士的天主教堂（即東、南、西、北四堂）都扮演了傳播西方文明的基地的角色，發揮了多方面的文化傳播功能，其中南堂無疑為各堂之首，扮演了“第一把小提琴”的角色。這是因為：



老南堂的十字架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藏

一、南堂是北京四座天主教堂中歷史最為悠久的，它又長時間被作為北京教區的主教座堂，是以葡萄牙為背景的、最早來到北京的耶穌會士長期居住和經營的教堂。雖然後來陸續建造了東堂、北堂和西堂，但是在耶穌會被解散之前的一百七十多年裡，特別是在1775年南堂遭受毀滅性的火災之前，它一直以科學儀器最為齊全、藏書最為豐富、繪畫最為精美而成為北京四座教堂之冠。

二、雖然後來法國耶穌會士以及他們所建造的北堂也很出色，但是由於法國人的理念與葡萄牙人（包括以葡萄牙人為背景的意大利人、德國人等）有所不同。如方豪先生所言：“葡國教士側重以西洋科學介紹於中國，法國教士則各以中國文化介紹於歐洲，如中國文學、歷史、地理、民俗、藝術及物產、工藝學。”⁽⁶⁹⁾所以在向中國人傳播西方文明方面，南堂與北堂相比一直處於領先的地位。

三、因為南堂所處的地理位置與東堂和北堂不同。它正好位於宣武門內的交通要道旁。在清代，內城不允許漢族的官員和文人居住，他們幾乎都住在宣武門外的外城地區，每當下朝回家總不免要路過南堂，因此那些對西學感興趣的文人順道進入參觀的機會就比較多。而北堂則與紫禁城毗連，除非專責辦理公務，官員文人很少有機會路過和參觀那裡。東堂處於皇城以東，情況與北堂有些相似。這也是為甚麼官員文人們留下關於南堂的文字記載比較多的原因，也是為甚麼在幾座歐式教堂中，恰恰由南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發揮着中西文化交流領導者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學、藝術與宗教的關係

從利瑪竇開始，來華耶穌會士們刻意將北京的天主教南堂辦成兼有展示涉及歐洲科學、藝術等多方面文化的博物館。眾所周知，其更深的意義還在於傳播天主教。從利瑪竇開始就把“科學傳教”與“文化適應”作為他在中國傳教的一雙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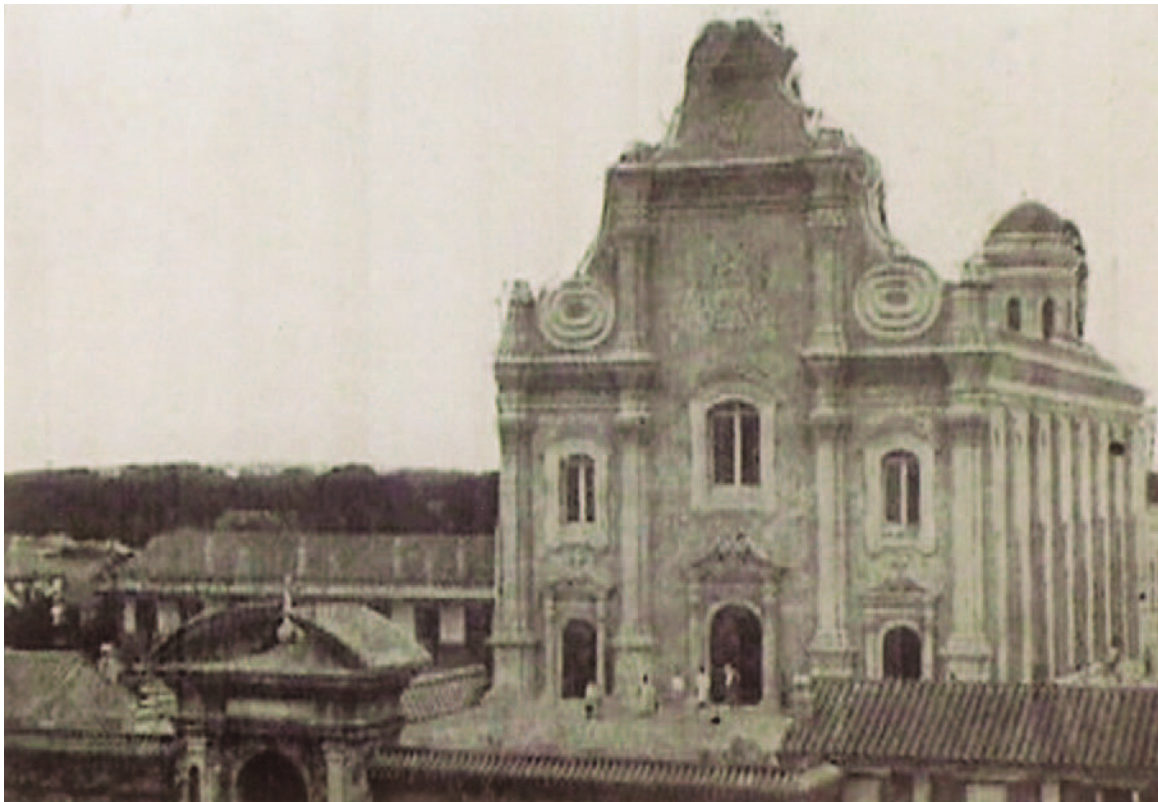
利瑪竇去世之後，教會內部曾就傳教士是否應該將一部分精力用於科學文化活動發生過爭議，但

是經過明末的“南京教案”和清初的“曆獄”兩次挫折之後，思想就比較一致了。

對此，南懷仁在《歐洲天文學》一書中曾作了系統全面的論述。他說：“天文學的光芒會清晰地反射在我們的宗教上”，“天文學的復興對我們的宗教的復興來說，既是它的開端，又是它除了天主之外的唯一動因”，“天文學成為保持我們宗教在整個中國生存的最為重要的根”。“我們的敵人楊光先，開始發動旨在從中國徹底根除天主教的攻擊的時候，他同時也使出了全部力量來根除我們的天文學。當然從中國剷除我們的宗教並不困難，但是要剷除我們的天文學卻是非常地困難。因為已故的先皇（即順治皇帝福臨）曾莊嚴鄭重地介紹了她，而她在整個中華帝國已經被接受了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除此之外，多少年的經驗已經證明，當中國的天文學明顯地與實際發生的天象相背離時，而她則是如此精確地與天象相符合。事實上，楊光先的指控是對的，正是由於湯若望神父和他所領導的欽天監的威望，我們的神父們才能分散地居住在不同的省份，開辦教堂；並且一次又一次地將新來的傳教士們帶入中國內地。”他引用在討論從廣州的流放地召回幾名傳教士神父們而舉行的王公貝勒九卿科道會議上一位滿族官員的話說：“既然南懷仁的天文學能夠如此精確地與天象相融合，正如我們都親眼看到的那樣，為甚麼還要懷疑他的宗教呢？”⁽⁷⁰⁾

南懷仁把天文學、數學及其它門類的歐洲科學與藝術形象地比喻成繆斯女神，比喻成神聖天主教的侍女，他說：

我還要為我們的天文學添加幾位最迷人的數學女神，作為她最美麗的侍女，以便以她們平和的表情和笑容將天文學嚴厲的面孔變得稍微柔和一點，也使天文學能夠更加容易地接近皇帝和其他權貴。不僅如此，作為神聖宗教的女僕，她們還必須服從她的意志，因為她莊嚴的風度令異教者敬畏更勝於愛慕，所以當她打算要進入高貴的殿堂時，她們必須先走一步，



1900 年義和團運動後的南堂

巴黎遣使會檔案館藏

為她打開入口的大門。(71)

南懷仁在《歐洲天文學》一書的末尾寫道：

因為中國人經常是傲慢地鄙視外國人，自認為比他們高人一等，也因為中國人驕傲地自認為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除非讓他們在閱讀我們關於高尚美德和各種科學的書籍時，像照鏡子一樣無言地看到自己的無知和卑鄙，是沒有辦法使他們輕易收起傲慢地向人炫耀的羽毛的。這種辯論是具有理性力量的。

他不無自豪地說，科學傳教的確是個“高明的主張”——

比起我們通常在鼓吹與天主教相關聯的事情時表現出的常規的說服力來，中國人對歐洲科學的嚮往對我們傳教士的幫助要更大些。機敏而博

學的中國人不得不讓自己信服一個顯而易見的觀點，甚至當他們充滿嫉妒心理和邪惡情感，成為我們的敵人時，也不得不承認：“當歐洲的所有製成品和所有的科學是如此地發達，那麼構成這一切的基礎理論，即歐洲人如此虔誠地信仰著的、他們對之的熱愛超過一切科學的天主教，必然是建立在偉大而堅實的基礎上的。”

因為聖母瑪麗亞是通過天文學而最早被介紹到中國的，因為她也曾隨着天文學一道而遭遺棄，同時也因為在多次被拋棄之後，她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而且成功地由天文學恢復了她的尊嚴，所以天主教就被合乎邏輯地描繪成最具威嚴的女王，依靠着天文學的幫助公開地出現在中國大地上。而歐洲其他各種精密的科學，也緊緊地站在聖母瑪麗亞一邊，圍繞着她，成為她最具魅力的同伴。甚至在今天，以所有站在她一邊的科學為伴侶，她比以前容



19 世紀南堂留照 巴黎遣使會檔案館藏

易得多地在中國各處漫遊。(72)

南懷仁的這些形象而生動的描寫，將中國在那個時代科學、藝術、文化與天主教的關係表述得淋漓盡致。

有人說，歷史常常愛跟人們開玩笑，人們的初衷是進入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對於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來華傳教士而言，傳佈天主教才是他們主要的和根本的目的，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祇是次要目的，或者說僅僅是手段，然而在中華文明發展的長河中，他們在後一方面的功績則遠遠超過了前者。他們所開創的“西學東漸”對中國科學史（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地質學、測繪學、氣象學、水利學、力學、物理學、光學、機械學、建築學、化學、造紙印刷術、人體科學、西醫藥學、動植物學、釀酒業，等等）、藝術史（美術包括油畫和雕

塑、音樂包括樂器、樂理、樂曲、園林藝術，還有玻璃、琺瑯及鼻煙壺的製造工藝，等等）和人文學史（倫理學、哲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等等），都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在有些領域甚至是從無到有的開創性作用。

在近代中國學術界的絕大多數學科門類中，祇要追溯其發展史，都無法回避“西學東漸”的影響。中國的小學生，從一入學時語文課上學習的中文拼音，到算術課上學的豎式筆算演算法，自然課上的日食、月食的成因，地理課上的五大洲四大洋知識，音樂課上的記譜方法等等方方面面的初級啟蒙知識開始，到中學時學的平面幾何、平面三角、對數函數、物理學的杠杆、滑輪等知識，無不來自那“西學東漸”時期的文化交流。

因此可以說，如果利瑪竇等來華傳教士僅僅是單純的福音傳道士，那他們充其量祇能影響不到百分之二的中國人；而他們在傳播西方科學與文化的



20 世紀南堂留影 巴黎遣使會檔案館藏

貢獻，則為“中華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進而影響了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即使他並不是天主教的信徒。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對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事業所作的超越宗教層面、而着眼於全人類科學藝術發展的評價：

我認為（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壯舉。它不僅有利於上帝的榮耀，基督教的傳播，亦將大大促進人類的普遍進步，以及科學與藝術在歐洲與中國的同時發展。這是光明的開始，一下子就可完成數千年的工作。將他們（中國）的知識帶到這兒，將我們的介紹給他們，兩方的知識就會成倍地增長。這是人們所能想像的最偉大的事情。⁽⁷³⁾

本文所論述的 17-18 世紀的北京天主教南堂在科學、藝術、文化的多方面功能，其歷史意義也在於此。

【註】

- (1) 趙翼：《甌北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出版，頁 126-128。
- (2) 《人民日報》1998 年 5 月 20 日。
- (3) (4) 《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 1983 年，頁 514-515；頁 515。
- (5) (6)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台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 1986 年，頁 391；頁 536。
- (7) João Basto：〈十七世紀葡國為建造北京兩座最早的耶穌會教堂所作的貢獻〉，《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 期，澳門文化司署 1987 年，頁 31。
- (8) 裴化行：《利瑪竇評傳》，頁 617-618。
- (9)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頁 153。
- (10) 〈正教奉褒〉，《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485。
- (11) (12) 魏特：《湯若望傳》（上），商務印書館 1949 年，頁 250。
- (13)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見《中國天主教世紀彙編》，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160。
- (14) 劉肇國：〈贈天主新堂記〉，見《碑記贈言合刻》，存於羅馬耶穌會檔案日本中國卷 III 24.5。筆者得到美國喬治敦大

學魏若望教授的幫助，方才見到此珍貴資料。特此致以深深謝意。

- (15)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鈞譯，頁383。
- (16) 王世仁等主編：《中國近代建築總覽（北京篇）》，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3年出版，頁383。
- (17)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見《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頁186-187。
- (18) 樊國梁：《燕京開教略》1905年救世堂刻本（中篇）。
- (19) 黃伯祿：〈正教奉褒〉，見《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頁567。
- (20)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史〉，見《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頁216。
- (21) 見樊國梁：《燕京開教略》（中篇）。
- (22)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53。
- (23) 談遷：《北遊錄》，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頁45。
- (24)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三，中華書局出版，頁66-67。
- (25) 張景運：〈秋坪新語〉，轉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岳麓書社1987年出版，頁920。
- (26) 《清詩紀事》乾隆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5714。
- (27) (28) (29) (30) (朝) 朴趾源：《熱河日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頁326。
- (31) 張庚：〈畫徵錄〉卷中，轉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岳麓書社1987年出版，頁911。
- (32) (33) 南懷仁著：《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 J. (Dillingen, 1687)》，高華士（Noel Golvers）英譯，魯汶南懷仁基金會1993年出版，頁116-117；頁115。
- (34) 轉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岳麓書社1987年出版，頁890。
- (35) 談遷：《北遊錄》，頁278。
- (36) 尤侗：《西堂集》，轉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岳麓書社1987年出版，頁894。
- (37) 南懷仁著：《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 J. (Dillingen, 1687)》，高華士（Noel Golvers）英譯，魯汶南懷仁基金會1993年出版，頁127-128。
- (38) (41) 趙翼：《簞曝雜記》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頁36。
- (39) 趙翼：《甌北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頁126-128。
- (40)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頁153。
- (42)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乾隆朝卷，江蘇古籍出版社，頁6465。
- (43) (44) (朝) 洪大容：《湛軒燕記》，轉引自黃時鑒：《東西交流史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頁430；頁426。
- (45) 鄭以偉：〈泰西水法序〉，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989年，頁311。
- (46) 徐光啟：〈泰西水法序〉，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309。
- (47) (48) (49) (50) 南懷仁著：《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 J. (Dillingen, 1687)》，高華士（Noel Golvers）英譯，魯汶南懷仁基金會1993年出版，頁64；頁120；頁123。
- (51) 楊廷筠：〈刻西學凡序〉，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292。
- (52) 李之藻：〈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989年，頁253-256。
- (53) 王徵：〈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298。
- (54) 畢拱辰：〈泰西人身說概序〉，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304。
- (55) 《利瑪竇中國割記》，頁481-482。
- (56) 談遷：《北遊錄》，頁278。
- (57) (美) 魏若望：〈湯若望與明清變遷〉，《國際漢學》第七集，中華書局2002年出版，頁304。
- (58) (59) 楊怡：《湯若望在中國的著述》，見《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華裔學社1992年出版，頁1078。
- (60) IHS 應為耶穌會的標誌。
- (61) 魏特：《湯若望傳》（上），商務印書館1949年，頁251-252。
- (62) (63) 轉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岳麓書社1987年出版，頁933。
- (64) (65) 《贈言》，見《徐家彙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頁982；頁983-984。
- (66)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頁207。
- (67)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中華書局1995年出版，頁915。
- (68)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岳麓書社1987年出版，頁803。
- (69) 方豪：〈北京北堂圖書館小史〉，轉引自李希泌、張淑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頁526。
- (70) (71) (72) 南懷仁著：《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 J. (Dillingen, 1687)》，高華士（Noel Golvers）英譯，魯汶南懷仁基金會1993年出版，頁54-57；頁57；頁131-132。
- (73) 〈萊布尼茨中國書信集〉，頁55。轉引自李文潮、H. 波塞爾編：《萊布尼茨與中國》，科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頁75。